



● 宋豫秦 等 著

中国文明起源的 人地关系简论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

宋豫秦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环境—社会复合系统的理念出发,依据作者直接参与发掘、研究的田野考古资料和以往有关全新世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探讨了西辽河流域、甘青地区、环岱海地区、海岱地区、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环太湖地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人地系统演变历程和人与地关系作用机理。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促进考古学与地学和环境科学的结合。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考古学、人文地理学、全新世环境变迁及区域发展等研究的学者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宋豫秦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ISBN 7-03-010655-5

I. 中… II. 宋… III. 人类-关系-环境-中国-古代 IV. 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758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改 责任校对:朱光光

责任印制:刘秀平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丽源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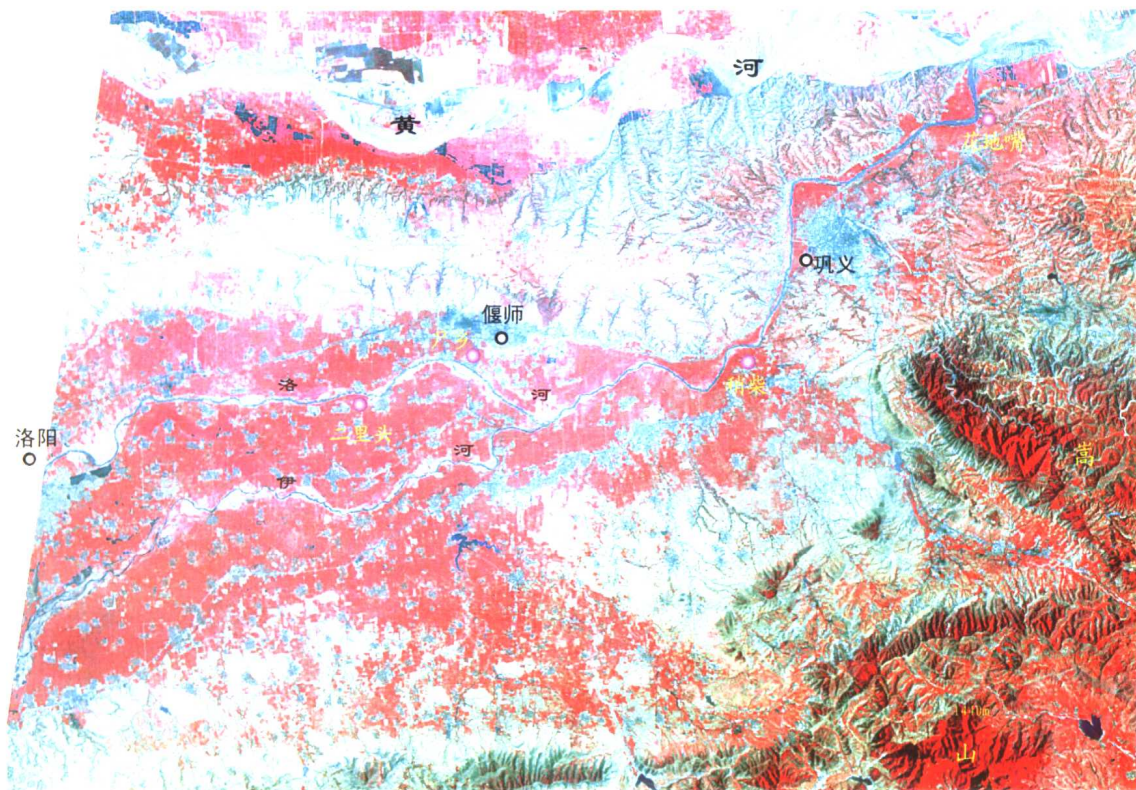
2002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插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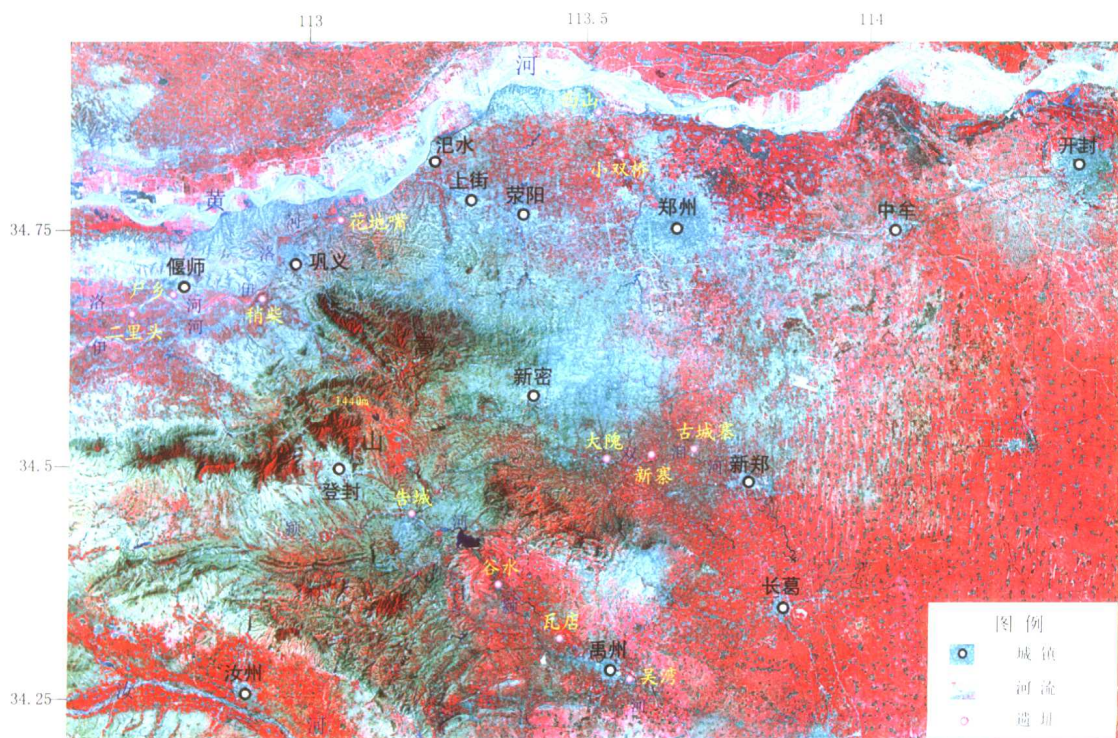
印数:1—1 600 字数:302 000

定价:7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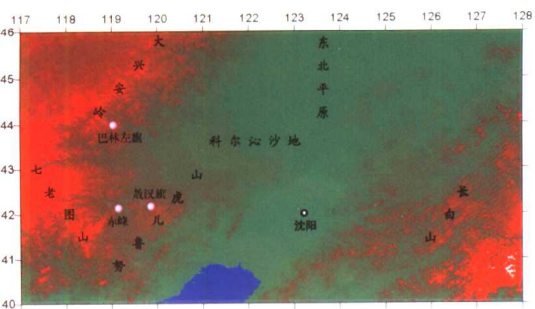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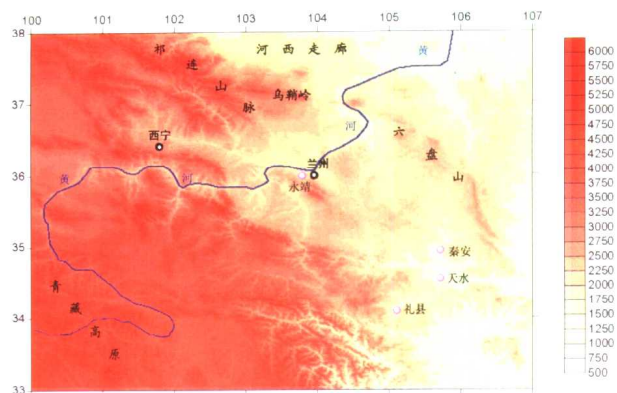
1. 伊洛河流域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由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杨瑞霞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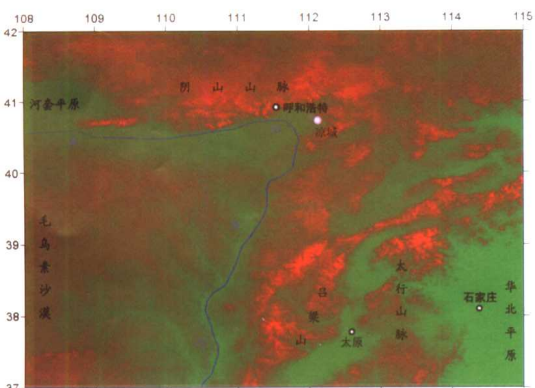
2. 嵩山南北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由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杨瑞霞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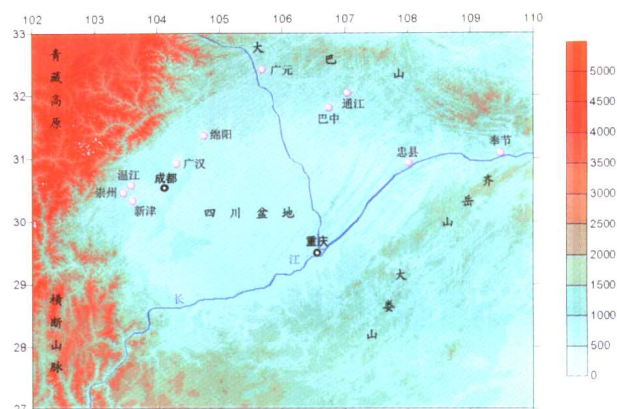
3. 西辽河流域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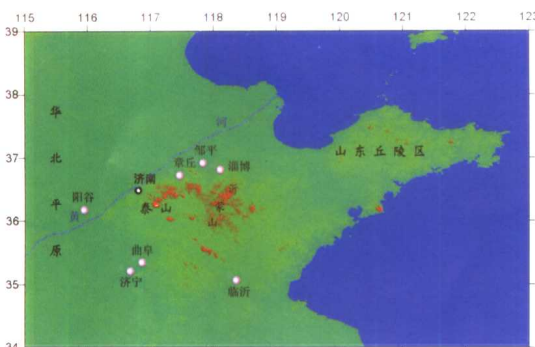
4. 甘青地区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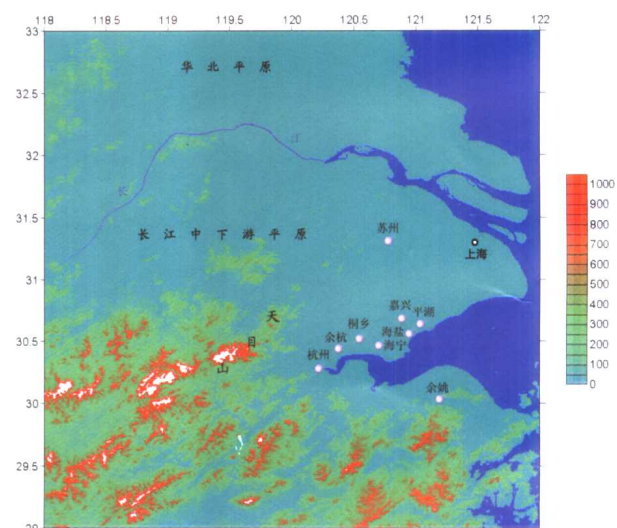
5. 环岱海地区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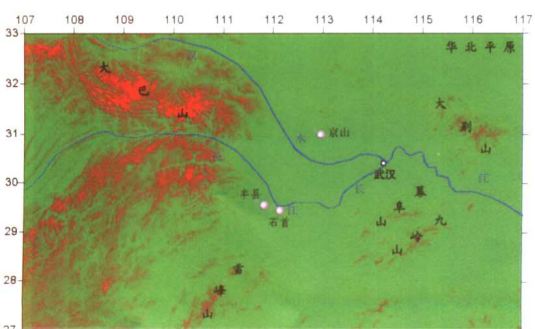
6. 四川盆地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7. 海岱地区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8. 江汉地区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9. 环太湖地区典型遗址分布区域地形图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人地关系理论回顾	4
1.3 考古学与人地关系研究	12
1.4 景观生态学与文明起源研究	13
1.5 生态过渡带是人类文明的“孵化场”	15
1.6 中国早期文化的生态格局	16
1.7 有关国外早期文明兴衰的理论简介	19
1.8 “盖雅假说”的启示	26
第二章 西辽河流域	31
2.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31
2.2 全新世环境变迁	35
2.3 文化内涵与特征	43
2.4 人地关系分析	50
2.5 小结	52
第三章 甘青地区	55
3.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55
3.2 全新世环境变迁	57
3.3 文化内涵与特征	59
3.4 人地关系分析	64
3.5 小结	76
第四章 环岱海地区	77
4.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77
4.2 全新世环境变迁	80
4.3 文化内涵与特征	83
4.4 人地关系分析	88

4.5 小结	94
第五章 海岱地区	95
5.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95
5.2 全新世环境变迁	97
5.3 文化内涵与特征	101
5.4 人地关系分析	114
5.5 小结	118
第六章 四川盆地	119
6.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119
6.2 全新世环境变迁	125
6.3 文化内涵与特征	126
6.4 人地关系分析	131
6.5 小结	132
第七章 江汉地区	134
7.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134
7.2 全新世环境变迁	137
7.3 文化内涵与特征	139
7.4 人地关系分析	155
7.5 小结	170
第八章 环太湖地区	171
8.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171
8.2 全新世环境变迁	172
8.3 文化内涵与特征	176
8.4 人地关系分析	186
8.5 小结	195
第九章 中原地区	197
9.1 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特征	197
9.2 全新世环境变迁	199
9.3 文化内涵与特征	202
9.4 人地关系分析	211
9.5 小结	221
第十章 结语	223
后记	227

第一章 总 论

1.1 研究背景

十余年前兴起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 热点主要集中在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面, 如中国文明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青铜、文字和城堡是否为衡量中国文明起源的“三要素”, 等等。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除了社会的内在动因外, 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但以往的研究却基本都是围绕着“人与人”的关系展开的, 至于文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却是一个有待于拓展的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主体及其文化绵延八千余年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中心^①。中国的土地上遍布着众多族的共同体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 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 这使得中国文明的人地关系研究既具典型性, 又具可行性。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趋尖锐, 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危机, 严重制约着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在此形势下, 国际科学界于 60 年代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 70 年代组织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 80 年代组织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可以看出, 这些计划具有朝着宏观和交叉方向延展、由侧重自然朝着侧重自然与人类相结合的趋势。尤其重要的是, 80 年代国际科学界联合发起了一项近 80 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y)。

“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一词首次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为人类学家所使用, 主要是表达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愈来愈不稳定, 特别是国际安全和生活质量逐渐降低这一特定意义。至 80 年代, 自然科学家借用并拓展了这一概念, 将生态系统的各个圈层纳入到了“全球变化”的范畴, 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②。由于

① 中国早期文明的内核或主干是以伊洛河流域为重心的华夏文化, 或者说华夏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代表。华夏文明的演化过程是: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早商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周文化—秦汉文化。这一演化过程脉络清晰, 主次分明, 从未中断。由于裴李岗文化的上限已近 9000aB. P., 所以可以说,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主体及其文化绵延八千余年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中心。

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高等教育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 1998 年。

该计划的目标是对整个地球系统,包括其演变过程、人地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所以,它包括“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主要子计划。中国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在全球变化领域理应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性贡献”^①。全球变化研究以数千年到数万年尺度的研究最为薄弱,而我国丰厚的考古学遗存,正是开展“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研究的独特优势。

上述背景促使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一些从事地理环境研究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扩展到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领域。国际社会和我国的权威决策机构,已经将这一研究领域提升到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将环境演变研究纳入了正式文本。近年来,有关古往今来的“人地关系”,正在成为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研究的目标,其中不少青年学子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主题。

汤因比曾经说过,“人类只能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接受灭种的命运,或学习天下一家的生存之道”。当代西方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重点着眼于从古到今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们认为,环境变迁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史,从而认为环境是综合的、人造的。1980年比尔斯基(Bilskey)发表的《历史生态学——环境和社会的变迁》,1988年沃斯特(Worster)发表的《地球的终结》,被认为是当前西方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研究的代表作。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就较深刻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格、精神面貌以及人类社会的性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②。他举例说,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精力充沛”、“富于热忱”,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亚洲气候炎热,各民族“多擅长技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故常为人臣,甚至沦为奴隶;希腊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既具热忱,也不乏理智。他指出,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粮食必然丰富,一部分人就可专门从事智力活动,从而促进文明的发展。他还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心灵也有影响,因为地理环境影响人的想象力,可以刺激理性的发展。“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印度)使人产生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希腊)时,就使人类早期发展了理智”,故前一地区常表现为宗教重于科学,情绪高于理性;后一地区则理性发达,科学高于宗教,理性重于情绪。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就是这种观念的早期体现。

地理环境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例证不胜枚举。如全新世大暖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1998年。

② 参见王恩涌:《关于“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认识》,《论地理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地处亚热带边缘,气候温暖湿润,易于人类趋利避害,故三代文明和后来中国的统一王朝大多都定都于黄河流域。殷末周初、汉魏之交、北宋时期、元代、清初都是中国晚全新世的寒冷期,恰恰正是在这几个时期,北方诸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侵扰中原。耐人寻味的是,周边民族入侵中原后,双方往往是在秦岭—淮河这一地理分界线南北对峙。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中国先贤对于自然环境制约社会政治这一现实的形象总结。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很显著。如自中全新世以来,中国的400mm降雨线长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带;而淮河流域这一地理分界线,也长期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过渡区。

人类活动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也有巨大的反作用。进入早期农业社会以后,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干扰不断加大,如传统的刀耕火种型粗放农业导致了人工植被对天然植被的替代;地球上遍布的荒漠化景观,绝大多数都是不适宜的人类活动造成的。自全新世早期开始以迄近代,人类的不合理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强度和广度,在许多地区都是自然干扰无法比拟的。

认为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微不足道的观点其实并无实据,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埃及先民所建金字塔之例即有力的反证。国外有的农史专家指出,4000 aB.P.前后,旧大陆几乎所有的宜耕土地都已被开垦殆尽。正是由于当时地广人稀、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才使得以“广种薄收”为特征的撂荒轮作式农业垦殖活动成为必然。如果我们到近代仍保持着这种粗放型农业的少数民族地区做一番实地调查,再加以科学的类比,便不难认识到早期人类对于自然系统的干扰力度何等之大!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分册“总论”中明确指出:“环境问题可以说在古代就有了”;“环境科学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环境演化的规律……第二,揭示人类活动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第三,探索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第四,研究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还明确指出:“逐步建立起一个将环境的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结合起来,将微观研究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将静态研究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的”^①。可见,研究文明历程的人地关系,与环境科学四项主要任务的前三项,尤其是第一项密切相关。

遗憾的是,由于大气污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近几十年来才在世界范围内危及人类的生存,所以许多人似乎认为环境问题是当代所特有的。受此影响,我国的环境保护队伍多年来基本在扮演着类似于“救火队”的角色,而无暇探究环境科学领域的深层规律。造成我国环境保护队伍此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近代以来人本主义膨胀,人类很少虑及自身行为与自然界之间累积已久的显性和潜在对立,因而在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中缺乏充分的理性基础。

其次,各种环境危机来势迅猛,且加速蔓延,迫使环境保护工作者穷于技术层面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的应对,使得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

其三,环境科学本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的交叉学科,但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者绝大多数都仅有自然科学背景。并且,忽略乃至排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环境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的趋向至今仍严重存在^①。

显然,研究早期文明的人地关系,对于深化和完善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人地关系理论回顾

“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并非仅指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地关系理论所谓的“人”,是指社会性的人,即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地”不仅包括地球系统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诸要素共同构成的自然环境,也包括因人类作用而改变了的人文地理环境^②。

人地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即已存在,就此而言,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并无质的区别。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并与之发生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③。人地关系集中体现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两大方面^④。

生产活动中的人地关系主要体现在:

其一,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决定着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

其二,自然环境以其提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一般而言,资源条件好的地区人类生产活动产生较早,经济发展较快。

其三,自然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平原宜耕,山区宜林,草原宜牧。直到今天,产业类型的布局 and 自然资源的分布仍密切相关。

其四,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而且以负影响为主,主要表现在导致自然资源数量减少和自然环境质量下降两方面。

生活中的人地关系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习惯、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三方面的影响:

其一,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如我国北方人喜面食,南方人喜稻米,乃是由于北方和南方各有适宜小麦和水稻生长的自然环境。

其二,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理特征具有重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种的差异。生理的差异又造成人们对环境适应性的不同,如生活在热带非洲的黑人耐酷暑,北极

① 宋豫秦:《关于中国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待刊。

② 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③ 金其铭:《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④ 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修订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圈中的爱斯基摩人无畏严寒, 青藏高原的藏族则能够适应高原缺氧环境。

其三, 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心理和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社会环境的作用, 进一步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一般而言, 恶劣的环境使人勇于奋进和抗争, 善于居安思危, 不断探索创新; 而舒适的环境则易使人安于现状, 不图思变。

总之, 人地关系作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不论从宏观区域甚至全球的角度, 还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 都能发现它的存在。

在古代社会, 人们受知识的局限, 对于自然界缺乏充足的认识, 人地关系问题仅为少数思想家所关注, 大多潜伏在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之中, 未能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①。到了近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自然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因之逐步形成了人地关系的理论体系。

人地关系理论不仅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也是近代哲学思想宝库的组成部分^②。近代人地关系理论体系的诸多派别都各有其哲学的渊源, 故也可认为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实际上是从哲学思想体系中孕育而生的。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西方世界的人地关系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古希腊时期是上古文明在科学上的繁荣时代, 西方地理学即发端于古希腊^③。

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公元前 460~前 377)所著《论空气、水和地方》一书可谓研究人地关系的专著。该书着重论述了不同气候条件对人的性格造成的影响。受其影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也在《政治学》一书中论述了地理条件与城邦的发展和安全的关系^④, 他还提出地理位置、气候等对人的性格、精神面貌的形成以及人类社会的性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史》则由希腊诸民族所占有的土地性质及其地理位置来解释希腊民族的特质及命运。柏拉图更以地理环境解释希腊分裂混乱的原因^⑤。另外, 埃拉脱色尼、斯特拉波、伊德列西等也都有不少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⑥,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⑥。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加上宗教桎梏, 严重制约着人们对于大千世界的理解。经院哲学不仅无视客观现实的存在, 而且置理性于神的绝对统治之下。在此背景下, 人地关系理论自然也很难得到深化。

文艺复兴运动为人地观的革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开始广泛地

① 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② 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修订本),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③ P. 詹姆斯著, 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16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④ 王恩涌:《关于“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认识》, 《论地理科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⑤ 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 《人文地理学论丛》,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⑥ 罗伯特·迪金森著, 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18~19 页,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融入哲学、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在解释民族、政治、宗教等社会现象形成原因时,突出地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其观点与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相似,属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人地观。紧随其后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也肯定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①。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克尔(1821~1862)在《英国文明史》一书中也探索了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其观点与孟德斯鸠相似。

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世界对于人地关系的探讨迅速深化。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1769~1859)和李特尔(1779~1859)也是近代人地关系理论的主要创立者^②。洪堡在《宇宙》第一卷之末尾写道:“人类在生活上到处和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虽然比起植物来,他依赖于他周围的大气气象变化的程度较小——他能借助于精神活动和智力教养的提高来轻易地摆脱自然力的控制,还具有使他自身适应于各种气候下生活的惊人能力”^③。李特尔则在其《地理学》一书中称地理学的中心原理为“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与人类的关系”。此后,德国的李希霍芬(1833~1905)更认为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的最高目的。而拉采尔(1844~1904)的《人类地理学》被认为奠定了“环境决定论”产生的土壤^④。

拉采尔的思想通过其学生辛普尔(1863~1932)所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得以广泛传播。该书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体质、民族发展和国家历史的影响。不过,辛普尔在阐述拉氏的观点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谈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不用“控制”,而用“影响”。辛普尔的观点也有别于同时期的亨丁顿(1876~1947)在其《气候与文明》一书中极力宣扬的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作用^⑤。

当“地理环境决定论”得以大肆宣扬的同时,法国人地派地理学家白兰士(1845~1918)提出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人地观——“可能论”(亦称“或然论”)。其中心思想认为人和地(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然是否能够为人类发展所利用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⑥。他认为“人”和“地”这两个因素,人是积极因素。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或者以地对人的影响为主,或者以人对地的影响为主,二者互为因果^⑦。这一观点成为20世纪初人地关系思想的主流,并得到他的学生白吕纳和另外一位法国学者瓦洛的完善。

① 王恩涌:《关于“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认识》,《论地理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③ P. 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1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④ 金其铭:《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⑤ 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修订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18~1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旭旦:《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白吕纳在《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对白兰士提出的“人类的选择能力”进行了解释,认为白兰士的“人类的选择能力”来自“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随不同社会和时代而变迁的”,所以“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白兰士的人地关系互为因果的理论较客观地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实质。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其理论仍然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受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美国学者巴罗斯(1877~1960)和英国学者罗士培分别提出了“适应论”和“协调论”(或称生态论)。他们更加强调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并提出了“协调”的思想,指出人类需要主动、不断地适应环境对人类的限制。这种“适应”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人类有意识地对人地关系的协调。

美国地理学者索尔在1925年提出了“文化景观论”的人地观。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按地区联系的各种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人文事物及其在各地区的差异的学科。他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的研究核心,理由是景观一词理当与人文兼容并蓄。这一主张较早地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

还应提及的是“二元论”和“非决定论”人地观。

二元论、非决定论是否定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的一派观点。洪堡和李特尔都主张地理学的一元性,但在他们逝世以后,其一元性理论受到非议。以德国佩舍尔为首的一些人反对地理学的人文方向,认为地理学只是对地球表面形态的研究,而人类活动不在研究范畴之内。

在十月革命前,环境决定论思想由德国传入俄国。然而,它在一开始就受到上下各方的反对。“列宁本人曾对黑海以北的草原,因气候不好,所以不能用以耕作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他说这种观点是以现有技术水平为根据的,它忽略了不可避免的技术变革”^①。

前苏联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本国难以立足,但代之而来的是过于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各自规律的“二元论”人地观。这种人地观认为,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各自按自身规律发展,所以应分开来研究。C. B. 卡列斯尼克就曾经说:“既然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受各自的特殊规律制约的,那么必然应得出下面的结论:任何地理环境都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社会也不是地理环境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② 卡列斯尼克的观点过分强调人与地的特有规律,实际上却将两者割裂开来。

除了上述观点外,另有很多学者持强调人类作用的人地观。影响较大的是以康斯坦丁诺夫和费根为代表的经济学派。他们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割裂开来的倾向^③。此外,以萨乌什

① P. 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1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萨乌什金著,毛汉英等译:《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和实践》29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③ 金其铭:《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

金、阿努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提出了人地一体、相互影响的人地观。如阿努钦认为,“人类社会一方面作为决定其他自然部分变化的外部因素,另外又以物质的最高形态的特质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一方面和自然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这个相互作用的结果”^①。这种观点代表了前苏联现代的人地观思想,与西方学者的协调论、和谐论等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的人地关系理念至迟滥觞于东周时期,《禹贡》就记载了古代九州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状况。自此以降,关于人地关系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种^②:人制于天、人定胜天、天人合一。

《礼记·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已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③,属于人制于天的范畴。近代的梁启超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积极支持者,他到处用地理环境来解释古今中外的历史现状,不但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也由地理环境所决定。如他说先秦诸子思想各异,与他们所处的地域有关。孔子、墨子在北方,老子、庄子在南方,商鞅、韩非在西方,管仲、邹衍在东方,所以“或从实行,或毗思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相应”^④。

《孟子·公孙丑下》有一句影响至今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包含有人定胜天思想的萌芽。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中对各地的天然形势、关山险隘的分析,也处处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⑤。

然而,中国近代以前占主流的却是“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即人地协调观。“人”是一个较明确的概念,而中国古代哲学家有的认为“天”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的指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界^⑥。《中华思想大辞典》指出:“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调”。

存在决定意识。生态作为“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⑦,自然会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自战国时期以来,历代中国思想家都深刻地论证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始终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一中心而发展、成熟的。司马迁所谓的“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接近于我们所谓的人地关系。

汉初著名思想家贾谊强调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规律“六理”,六理不断衍生而超越自身,产生自然界之万物^⑧。

① B. A. 阿努钦等, 邝福光译:《地理学理论问题》181~182页, 贵州师大学报丛刊, 1986年。

② 谢觉民:《人文地理学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人文地理笔谈》,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③ 金其铭:《人地关系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年。

④ 萨乌什金著, 毛汉英等译:《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和实践》290页,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⑤ 季羨林:《人文地理学与天人合一思想》,《人文地理笔谈》,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⑥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2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⑦ 《贾子新书·六术》。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深远。其大意如：人若处事不当，天就会降下灾异，而灾异本身却是人事不当造成的。实际上其理论体系包括三个相互递进的命题^①：“天人相合”、“天人感应”、“人参天德”。他把天、地、人看做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出“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无一可也”^②；又曰：“天地与人，合而成德”^③，其意是说天、地、人不仅互为依存，而且三者的和谐共生可达到美好的境界。

《淮南子》一书也具有强烈的人地和谐理念^④。该书提出，由于东南西北中自然环境的差异，才形成了不同的景观和物产，并对人产生多种影响，包括体质、美丑、性情，甚至可决定婴儿的性别^⑤。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也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⑥。

除了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和杂家也有类似的思想。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

“天人合一”思想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地理学著作中。

《尚书·禹贡》记载禹治水是“随山刊木”、“随山浚川”^⑦，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观念。荀况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他在《天论》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制，夫是之谓能参”的精辟之见。《管子·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也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而行而应人”，主张人地各有规律。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种谷》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体现的是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协调人地关系的思想^⑧。

汉以降天人合一思想的不断完善，除了取决于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大自然的长期观察之外，也当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密切相关。

前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指出，“中国自上古时期（公元前 2200 年）至近代（1949 年）的 4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人口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缓慢增长到突然上扬的过程。这期间，中国人口—环境关系的变迁，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生态环境的‘黄金时代’；秦至西汉——环境第一次恶化时期；东汉至隋——环境相对恢复时期；唐至元——环境第二次恶化时期；明清以后至解放前——环

① 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252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③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④ 《淮南子·地形训》。

⑤ 《金匮要略》。

⑥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72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

⑦ 金其铭：《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境严重恶化时期”^①。

无疑,秦至西汉第一次出现的人口膨胀和随之而来的环境急剧恶化,必然会启发人们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所谓先秦时期生态环境的“黄金时代”是相对的。从考古遗址的分布密度和堆积情况看,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力度不可低估。那时的人口虽少,但实行的是“刀耕火种”式的粗放性农业,采集、狩猎和捕捞活动的规模也很大。根据民族学材料和民族志类比方法可以推测,早期人类(先秦时期)应当具有一定的保护环境意识,但当强度的粗放性开发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耦合时,仍然会发生严重的生态危机。以今例古,近年来在堪称“动植物王国”的云南西双版纳和植被繁茂的怒江峡谷,因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和粗放性开发活动,频频导致水土流失甚至引发泥石流的现实即其证^②。因此,先秦时期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治国安邦之大事,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规措施^③,如规定“有动封者,罪死而不赦”,鲁大夫里革甚至敢于为此冒犯君颜^④。孟子^⑤、荀子^⑥也都阐发了各自的生态保护理念。凡此,正恰恰说明当时业已存在生态危机了^⑦。

中国古代哲学可谓独树一帜,但科学精神却不如古希腊时的欧洲强烈。欧洲的地理条件培养了人们勇于探索的意志和力量,自古就有许多的航海家、探险家;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在大河流域,使人们形成了安于现状的人生观。19世纪末的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和古罗马的重视试验的传统,社会上科学思维之风大盛,这是欧洲近代科学迅速发展的土壤和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哲理和治国之道,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这种理念的写照。在科学研究方面重视功利和实用,如中国古代

① 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 刘隆等主编:《西双版纳国土经济考察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另据介绍,“怒江虽然每平方公里才有30人,根据怒江的自然状况与生产水平的现状,已不宜扩大耕地面积,同时还必须对坡度超过25度以上的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虽然怒江的土地垦殖系数才3%,但已超过了大自然允许的最高限度……”引自张惠君、陈铁军、和润培著:《怒江峡谷经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管子·七臣七主》:“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地。”管子并非一味强调保护自然,而是主张在合乎自然生发之理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管子还有环境与人口相协调的思想,“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

④ 《国语·鲁语上》:“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弃之……”

⑤ 《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⑥ 《荀子·王制》:“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川渊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⑦ 罗桂环、王耀先、杨朝飞、唐锡仁:《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